

# 《文心雕龙》与《诗品》形式 差异及其溯源

陈迪泳

**【提要】**《文心雕龙》在体大虑周的整体形式中形成圆照典雅的形式特征和注重“论文叙笔”的有机形式论,《诗品》则在思深意远的整体形式中形成品味新奇的形式特征和“止乎五言”的有机形式论。同时,在文学形式中溯源,两部文论著作的民族时代文化渊源相近,即儒途、道心、《易》理兼综,而其个人心理根源不同:刘勰在由佛入仕、实现理想的日神精神的鼓舞下创作《文心雕龙》,钟嵘则在特立独行、恣意纵情的酒神精神鼓舞下创作《诗品》。

**【关键词】**《文心雕龙》 《诗品》 文学形式 时代文化 个人心理

**〔中图分类号〕** IO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 (2011) 04-0092-05

第一部文论——刘勰《文心雕龙》和第一部诗论——钟嵘《诗品》,诞生在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语)的魏晋南北朝,并称“文论双璧”,二人被誉为“双峰并峙”。“双璧”和“双峰”,代有赞誉。齐梁时代沈约称《文心雕龙》“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清代何文焕编《历代诗话》称《诗品》为“百代诗话之祖”;鲁迅将《文心雕龙》与古希腊《诗学》相提并论(《题记一篇》)。《文心雕龙》研究成果蔚为大观,称为“龙学”;《诗品》研究则呈现“三多三少”现象:基础研究多,沿袭者多,封闭式多;范型研究少,有创意者少,开放式少。<sup>①</sup>有鉴于此,笔者尝试从文学形式的时代文化与个人心理溯源、心物关系中的生命意识、品鉴鉴赏论中的趋美情结等角度,借用古今中外的文艺学、美学、文艺心理学等理论和方法,对《文心雕龙》和《诗品》作系列性的比较研究,追踪溯源它们的民族与时代文化、作家心理的异同,更好地把握其美学生命。

## 一、关于形式的比较:体大 虑周与思深意远

清代章学诚说:“《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

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sup>②</sup>这点明二书的形式差异:体大虑周与思深意远。《文心雕龙》是以各种文体为对象,集史、论、评于一身的精细探讨“为文用心”的综合性文论专著。《序志》篇表明作者的思路是“弥纶群言”,态度是“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按《周易》的推演天地之数分为50篇,其整体形式是“体大虑周”。钟嵘以“三品升降”诠释作者,《诗品序》表明他的文学立场:有滋味、有风力、有丹采的五言诗是“诗之至”,创作要“直寻”“自然英旨”,其整体形式是“思深意远”。这种差异体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 1. 言说形式的差异:圆照典雅与品味新奇

从言说方式看,刘勰从宏观视域俯瞰文章(学),阐明文道,严谨、圆照,文风典雅。《知音》篇阐述鉴

① 王发国:《关于新世纪〈诗品〉研究的思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12期。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9页。

赏批评的理论和方法：“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sup>①</sup>“圆照”源于佛语，意为全面察看，要求评论家圆满、全面、公正地评价作品。“典雅”即优美不粗俗，符合规范。《文心雕龙》的严谨的理论体系——文道论、创作论、文体论和鉴赏批评论都鲜明地彰显“典雅”风格。《定势》篇归纳八种文学风格，其中“典雅者，熔式经诂，方轨儒门者也”。“典雅”即向经书学习，与儒家走相同的路。文道论中，刘勰明确提出“征圣”、“宗经”，以之作为《文心雕龙》典雅风格的鲜明标识。创作论也体现刘勰终其一生追求的“渐靡儒风”的儒家正气。《时序》篇分析各个时期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即文学在文采和思想内容上都要依据儒家经典，讲述经学。《风骨》篇云：“《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风”为教化根源，即作者的志气和作品的“风”相一致。“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定势》）。取法儒家经典的作品必然具有雅正之美。鉴赏批评论中，《程器》篇体现作家的道德人格对文章的重要性：“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弭中，散采以彪外，榘榘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理想的作家应该有文有质，德才并茂，能够进可堪当军国重任，退可保持独善而垂文后世。此为君子之典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文体论创造了风矩骨采、金镶玉式的审美意象。“风”指教化，“矩”为方正，“骨”指端正瑰丽的文辞，即文体写作要明确表达感化意义，充分显耀骨力辞采，即典雅的文风。“诗”的审美意象是“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明诗》）。诗歌宛如雅正润泽、清新华丽的大自然。“诤碑”傲然挺立的审美意象是“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诤碑》），纪念的逝者美德如清风、功绩如高山。这就是刘勰孜孜不倦追求的典雅纯美，既拥有儒家之浩然正气，又兼具阴柔阳刚的灵动之美的文学形式！《文心雕龙》的言说形式是辩证缜密的骈体的文论体系，追求典雅正统、体大虑周的唯务折衷和圆照圆通。

《诗品》则是非体系的诗论，“所录止乎五言”，<sup>②</sup> 细品“滋味”，是感悟的体验，文风趋向新奇。钟嵘以诗论体的言说形式，追求品味新奇的“思深意远”。《诗品序》表明品诗源于人物品藻之风，将原用于政治的“九品论人”推及诗人和诗作的品评，创造新奇的“三品论诗”的言说形式。第一，《诗品》新奇的品诗形式是论派别、溯源流。钟嵘将自汉迄梁的123位诗人以其成就高低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12人皆有渊源，中品39人中24人有渊源，

下品72人不推其源，归纳为三种文学风格：既温柔敦厚又富于文采变化的《国风》、既正变雅怨又饱含忧患意识的《小雅》、以及既怨悱凄恻又藻饰艳丽的《楚辞》。同时，《诗品》的评语多可互见。如李陵“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班姬“其源出于李陵”，“词旨清捷，怨深文绮”，王粲“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刘琨、卢谌“其源出于王粲，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这些评语既可把握这一脉诗人的整体特色，也可分析某一诗人。《诗品》还有单评与合评。上品皆一人一评，中品是二人以上合评，下品多为数人合评，这也有优劣之意。陈延杰《诗品注》云：“《诗品》之例，凡二三人以上同居一品者，或同出一源，或风骨相似。”如陆云、石崇、曹掾、何劭“四人骨力相等，故同居一品”，郭泰机、顾恺之、谢世基、顾迈、戴凯“五人同居一品者，以其风格皆警拔”，谢瞻、谢混、袁淑、王微、王僧达“此五人同品，盖以其源并出于茂先”。此外夫妇合评、僧人合评。第二，《诗品》显优劣的品评标准是“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诗品序》）。即以风力为骨干，以文采来润饰。魏晋以来，五言诗的创作极其繁荣，风格各异，流派纷呈。钟嵘以廓清天下诗歌为己任，曹植“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曹诗的文采风流、人工造化皆无与伦比。钟嵘以此最高标准裁衡其余诗人：刘桢“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很少”，气骨有余而情采不足，得曹植之一隅；王粲“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虽情文并茂而风力未遑，得曹植之另一隅；陆机“才高词赡，举体华美。气少于公干；文劣于仲宣”；谢灵运“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陆机、谢灵运虽然诗承曹植，却远逊于曹植。由上观之，钟嵘以恣意直率的新奇的言说形式，以曹植为标杆，感悟式地品评诗歌。

如前所述，《文心雕龙》与《诗品》分别以圆照典雅与品味新奇的鲜明特征及差异性彰显各自独特的言说形式。

## 2. 形式论的差异：“论文叙笔”与“止乎五言”

形式论指文学理论家对文学形式的认识和见解。柯勒律治说：艺术作品像活着的植物一样会生长，吸取多种元素到自己的本体中。它们的形状由内部决定，不是由外部压力或模子铸成。各个部分相互依存、相互促生。<sup>③</sup>《文心

① 本文所引，皆据陆侃如等译注《文心雕龙注》，齐鲁出版社1995年版。

② 本文所引，皆据徐达译注《诗品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③ 王先霭等：《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页。

雕龙》与《诗品》分别形成其形式论：“论文叙笔”与“止乎五言”。

刘勰创作自成体系的《文心雕龙》，以“论”的形式谈论文学理论，这得益于佛学引入、玄学兴起后，“论”因辨名析理而充分发展，由此形成由“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割情析采”组成的理论体系。《文心雕龙》属于文学理论著作、文章学著作和分体文学史，其中以论证文体——“论文叙笔”作为形式论的成果，形成理论系统、条理分明且剖析细致等特征。《序志》篇对“论文叙笔”的文体论研究作了方法论界定：“若乃论文叙笔，则固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文心雕龙》的第5篇《辨骚》至第25篇《书记》是文体论，由重在抒情言志、讲求音韵文采的“文”与政治学术性的、不重音韵文采的“笔”共35种文体组成，《辨骚》篇至《哀吊》篇所论文体属于“文”类，《史传》篇至《书记》篇所论文体属于“笔”类，《杂文》篇和《谐隐》篇“文笔”兼有。各种文体古来有之，刘勰描述它们的特点和发展演变，评析历史中的作家和作品，由此形成《文心雕龙》的形式论；广义的文学分为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

而钟嵘品评的对象单一，是狭义的文学——诗，且以五言诗为至美。《诗品序》云：“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者有滋味者也”，“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嵘今所录，止乎五言”。因为相对四言诗和骚体文赋，五言诗的内容和形式均恰到好处，是魏晋时期主要的诗歌形式，因此，《诗品》的形式论是“止乎五言”的“三品论诗”。

由上观之，《文心雕龙》和《诗品》的形式各显神采：刘勰给“弥纶群言”、“唯务折衷”的文论巨制赋予最华丽的结构形式——圆照典雅和“论文叙笔”，钟嵘则给“三品升降”的非体系的诗论著作赋予最率真的结构形式——品味新奇和“止乎五言”。两部同代且齐名的文论著作在最适合自己的思想和内容的形式中蕴含相近的时代文化内涵和相异的作家美学心理。

## 二、二者形式差异的溯源

美国符号美学家苏珊·格朗说，艺术是人类情感符号的形式创造。英国文艺批评家克莱夫·贝尔提出：艺术是有意义的形式。“形式”有意义，因为它蕴含社会历史内容与人类的审美感情。这表明：艺术形式蕴含民族和时代的文化，也蕴含作家的人生体验和美学心理。换言之，我们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形式“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即可探索艺术家的文化根源和心理情结。

因为在艺术家独特的人生旅途中，民族与时代的文化与个人的人生追求对艺术家的文艺心理与美学生命都产生深刻的影响，刘勰与钟嵘各自独特的生命意识分别在《文心雕龙》和《诗品》的艺术形式中有微妙生动的表现。由此，笔者欲穿透两部文论著作的艺术形式，逆流溯源，探索掩藏在艺术形式下的民族与时代的文化之源以及刘勰与钟嵘的个人心理之流，更深入细腻地聆听和感悟这两部旷世艺术杰作的天籁之音。

### 1. 民族时代文化渊源相近：儒途道心《易》理兼综

刘勰和钟嵘都生长于南朝的齐梁时代：刘勰于公元502年38岁时撰成《文心雕龙》；钟嵘于公元514年44岁时撰著《诗品》。<sup>①</sup>南北朝的文化根源是老庄道学复兴、玄学兴起、儒道佛三教合流、以及古代哲学思想《周易》。时代文化深刻影响了刘勰和钟嵘的思想观念及其理论体系。《文心雕龙》与《诗品》的艺术形式蕴含相近的文化渊源：儒途道心《易》理兼综。

刘勰深得儒、道、《易》三家思想之精髓。儒学思想承载刘勰的人生理想——“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君子处世，树德建言”；道家理想为他提供精神家园——“文果载心，余心有寄”；《周易》理论为他确立基本的宇宙观、哲学观和思维模式——“道”与“彰乎‘大易’之数”。因此，儒途、道心和《易》理充盈刘勰一生，成为《文心雕龙》的艺术形式的文化渊源。《序志》篇是《文心雕龙》的纲领和儒、道思想兼容并蓄的折射。首先，“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这些表明刘勰对儒家圣贤的推崇，并将“诗言志”引发的“振叶寻根，观澜索源”的审美旨趣与审美尺度衍化为“征圣”、“宗经”，这是充满虔诚的朝圣之心的儒家光明之途，也是《文心雕龙》艺术形式的鲜明徽章。其次，《序志》篇寄寓刘勰的道家之心：“傲岸泉石，咀嚼文义”，即远离尘世的纷繁喧哗、世人的尔虞我诈、仕途的悬崖陷阱，高傲地在泉石间隐居，推敲文义。少年刘勰的梦是“彩云若锦，攀而采之”，他攀采超越功利、天人合一的和谐之美。“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邹奭之群言‘雕龙’也？”著书立言，如雕龙般雕琢文心，这是刘勰立著的深远之意。“雕龙”应为道家之浪漫情怀，也是《文心雕龙》艺术形式的璀璨华表。再者，《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贯穿始终。它始于《原道》篇的“道”，终于《序志》篇的“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形成《文心雕龙》的格局：全书50篇。《易传》的“观物取象”说、“天地人三才”说、“八卦生成”说、“乾坤、《易》之门

<sup>①</sup> 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9页。

户”说等理论对刘勰的“原道”论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如《原道》篇中“《易》象惟先”，《征圣》篇中“‘四象’精义以曲隐”，《宗经》篇中“《易》张《十翼》”。《易》成为《文心雕龙》的思想之魂和言说之实。所以，儒、道、《易》三家理论融会贯通，共同铸就《文心雕龙》的思想内容和言说形式。

钟嵘时代的社会风气是儒玄并重，偏重儒学。首先，钟嵘吸收和修正儒家的文学观念。《诗品序》开篇明志：“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辉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源自《毛诗序》，主体情性“摇荡”有待于客体之“感人”和天地自然生命的“气之动物”。《礼记·乐记》曰：“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这是“气之动物”的理论阐释。《礼记·乐记》又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这是“物之感人”的思想渊源。钟嵘认为，诗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外化，即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人的性情根源于天地自然的生命本质——气，因此，诗是个体生命对自然生命的感发，并且“照烛三才，辉丽万有”，沟通人与自然及超自然的生命。儒家强调“天人合一”，钟嵘顺应人与世间万物的亲和。《诗品序》阐述诗的作用：“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钟嵘继承孔子的“兴观群怨”学说，强调“怨”，即立足个体的哀乐，诸如“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其次，《诗品》的言说形式充满道家玄学：“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自然”始于《老子·第25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自然”指自然而然、自己如此。钟嵘赞美“自然英旨”的诗作，即倡导自然清新的纯真精美的诗歌风格。“‘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即目”、“所见”、“直寻”皆为如实描写本来面目、直抒感受。当然，诗歌是主观创作，不可能纯粹“自己如此”，钟嵘倡导“直寻”“自然英旨”之“自然”就是道家之“自然”，是巧妙的、没有人为构造痕迹之自然。“滋味”说也源于《老子·第35章》：“道之出言，淡兮无其味。”娱人耳目的“味”是小味，“淡无其味”方为至味。钟嵘创造性地化用“滋味”的理论及言说形式：“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此“味”意为体味、品赏，

即诗歌的最高境界是使读者趣味无穷、使听众心动神摇。再者，钟嵘面对诗歌创作上“庸音杂体，人各为容”、批评上“淄澁并泛，朱紫相夺”<sup>①</sup>的混乱局面，欲建立新的诗学系统和理论秩序，这得益于《周易》的“易简”、“不易”和“变易”理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尤其受王弼的“以寡统众”、“举本统末”的思维方法的影响。对于诗歌史的发展，《诗经》和《楚辞》是“寡”和“本”，后世发展是“众”和“末”。作品千变万化，作家层出不穷，追溯其源皆为《风》和《骚》。钟嵘运用“易简”之理，将汉魏以来的诗派归为《国风》与《楚辞》两大系统。就完整的“推源溯流”法而言，渊源论是“其源出于某家”，即“不易”之理，如钟嵘评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本文论和比较论是对诗人及作品之特色的考察和对渊源的突破，即“变易”，如钟嵘评鲍照“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诗品》的言说形式源于《周易》的文化渊源。所以，儒、道、《易》三家理论融会贯通，共同铸就《诗品》的思想内容和言说形式。

2. 个人心理根源相异：由佛入仕的日神精神与特立独行的酒神精神

刘勰和钟嵘接受同时代的文化熏陶，这使其文论著作都有儒道《易》兼综的印记。然而，两人的出身门第不同、人生经历各异，这导致两人的心理情结相异。

刘勰出身寒门，不当和尚却皈依佛门僧佑，整理佛经十年。因为精研佛法经传是当时寒族接近上流社会的方便之门。《文心雕龙》撰成后，刘勰想得到当时权倾天下的沈约的肯定，“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弱者。”刘勰之志不在论文，其鸿鹄之志是“树德建言”，“擒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刘勰必定走进进佛寺，由佛入仕，而不会守在失怙无妻的穷家等待梦想实现。刘勰的自负性格和宏大抱负在《序志》篇中以梦的形式曲折地表露心迹：“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第一个梦极有深意。弗洛伊德指出，记忆中越是幼年年纪的梦越不可靠，梦本身无多大意义，有意义的是人提此梦的动机。刘勰在成年写作《文心雕龙》时提此梦，实则把他对自己文章的自负推前到幼年时代。其第二个梦——而立之年梦见孔子，表明他对孔子的崇拜，更是其自负心理、渴望“树德建言”、“奉时骋绩”的无意识表现——梦中的他成为圣人的亲炙弟子，即他由佛入仕了，实现了建功立业的宏愿！这是“日神精神”。日神阿波罗是光明之神，象征美的外观和幻像。尼

<sup>①</sup> 钟嵘：《诗品》序。

采认为,日神精神象征智慧和理想,通过追求梦幻世界的美丽外表而达到遮盖现实痛苦的目的。<sup>①</sup>刘勰正是以《文心雕龙》作为入仕——实现理想的晋阶之作,这需要有真知灼见、行文典雅、合乎时俗。刘勰第一次入寺的十年深得佛学经理,这使《文心雕龙》以“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割情析采”的结构成为我国第一部有完整周密体系的理论著作,也使其言说风格呈现文质彬彬、进退有度、辩证中庸的学者风范。所以,刘勰在“执术驭篇”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他表现日神精神的豪迈气概:登顶临风、君临天下、因实现宏愿而豪情万丈,赋予《文心雕龙》中庸、典雅的言说形式。

钟嵘出身士族,青少年时进国子监接受正规且良好的教育,然后进入仕途,逐步晋升,而在政治抱负难以实现的境遇下“立文”以求“不朽”。钟嵘天性聪慧,广泛结交社会才俊,见识新锐,形成意气风发、特立独行、率真直言的风格;他抽身仕途,摒弃察言观色的顾虑,故诗论酣畅淋漓、见地独到。这是酒神精神。酒神狄俄尼索斯象征情绪放纵,代表原始情绪,充满野性放纵与忘我陶醉,交织痛苦与狂喜。第一,钟嵘放纵自己的喜恶,率性恣意地以政治上的“九品论人”评判艺术,不仅直言宣称:四言诗“文繁而意少”,骚体过于铺张繁多,唯有五言诗“居文辞之要”、“有滋味”,而且无所顾忌地在自汉迄梁的文学史中海选123位诗人封品称才子,以“三品升降而显其优劣”。这可谓无拘无束、放纵畅快!如上品评曹植诗“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钟嵘用孔子评论门人的口吻给历史上的文人才俊分品列等;刘桢、曹植因诗歌创作造诣高而升堂入室,张华、潘岳、陆机因诗歌创作次稍而坐在走廊。这是何等率直且张狂的评判!尼采认为,酒神精神代表狂

热放纵的醉狂世界,沉浸在非理性的激情、享乐、迷狂的情感状态,获得与世界本体融合的最高欢乐。<sup>②</sup>第二,钟嵘赞美诗歌,因为诗歌“吟咏情性”,表达个性。此“情性”指物色之情和离怨之情,即指个体因离群而产生的悲哀和痛苦,如评《古诗十九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评李陵“文多凄怆怨者之流”,评左思“文典以怨”。第三,钟嵘倡导诗歌创作要“直寻”,即从感物(自然景物和人世沧桑)动情中直接求得胜语佳句,而不是在前人典故或诗作中寻词觅句,如“高台多悲风”、“明月照积雪”,都是诗人的直抒胸臆、自由流淌。所以,钟嵘表现特立独行、恣意纵情的酒神精神,赋予《诗品》自由、新奇的言说形式。

综上所述,在文学和文学意识都走向自觉且儒家、道家和《周易》三大文化高度融合的南北朝,刘勰在出生寒门的人生之旅中,在由佛入仕、渴望树德建言和奉时骋绩的日神精神鼓舞下,创作体大虑周、圆照典雅、“论文叙笔”的文体通论《文心雕龙》。钟嵘则在出身士族的人生之旅中,在抽身仕途、以立文求不朽而特立独行、恣意纵情的酒神精神鼓舞下,创作思深意远、品味新奇、“止乎五言”的诗体专论《诗品》。两部文论著作的形式风采万千,时代文化和个人心理的寻根溯源又彰显它们丰富生动、微妙别样的神采与情趣。《文心雕龙》与《诗品》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双峰并峙、双壁辉映,它们在相互辉映中,将永远放射隽永迷人的光彩。

本文作者: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责任编辑:马光

①② 鲁枢元等:《文艺心理学大辞典》,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39、639页。

## The Difference of *Wen Xin Diao Long* and *Shi Pin* in Form and Origin

Chen Diyong

**Abstract:** *Wen Xin Diao Long* was characterized by elegance and all-round consults in its form in the context of a grand style and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which focused on an organic form theory named “Paper Style”, while *Shi Pin* has characteristics of a novel taste and organic form theory called “Zhi Hu Wu Yan” in the context of profound thinking and meaning. Meanwhile, if tracing from the source of the literature form, the ethnic culture of the two works has a similar origin, that is, both includes “Ru Tu”, “Dao Xin” and Yi. Howev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origin of personal psychology in these two works. *Wen Xin Diao Long* was created by Liu Xie in the inspiration of the spirit of Apollo from Buddha into official career and making dreams come true, while *Shi Pin* was created by Zhong Rong in the inspiration of maverick and reckless spree of Bacchus.

**Key words:** *Wen Xin Diao Long*; *Shi Pin*; literature form; time culture; personal psychology